

「文之門」

OUTCOMES
OF
THE TEXT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

焦亚东 著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textuality in ch'ien
chung-shu's literary criticism

读者的心绪或许常被沉重的历史弄得十分恍惚。不过，记忆常常像空中月，
暂显的遗忘，瞬时的怀念以及飘忽迷心的回忆。

共同投射出这片恍惚不定的影像。在历史面前，我们常常感到，
无限的人的足迹。

据说文字向那绝于百年而不死的精灵，是一件难以取巧的冒险。如果心甘情愿地为一个简单的读者，
他并不是在一种令人感到沮丧的冒险。

文学的阅读当然意味着在无边无际的过去的岁月，地窖记忆，分享历史。但是，
文学的阅读也意味着语言的遗忘。读者读者记忆中的空白。

承认其个人的神秘体验。

这两种以分享或遗忘为特点的阅读方式转为互文性所接受。

「文之門」

OUTCOMES
OF
THE TEXT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

焦亚东 著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textuality in ch'ien
chung-shu's literary criticism

试看那毛泽东对鲁迅的形容有多么恰当。不过，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

拘泥的论点，和成的心法，以及种种细心的窥探，

所表现出的这个书呆子的形象，在历史面前，我们很难感到，

这是对人的认识。

钱氏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最明显地表现在对鲁迅的评论上。如果我们将鲁迅作为一个孤立的读者，

在书中寻找一些令人感到困惑的线索，

文字的痕迹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差异，在钱氏笔下，似乎已经，甚至，

文字的叙述也显得荒唐的境地，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钱氏读者个人的精神体验，

这则和以世界或社会为焦点的批评方式迥然不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之门：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焦亚东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633-6574-6

I. 文… II. 焦… III. 钱锺书 (1910~1998) — 文学评论—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77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91 号 邮政编码：530022)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211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在某一种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按照前者，希腊的马其顿，可比英国的蒙墨斯，因为两地都有一条河流。但是，按照后者，同一条河流里的每一个水波都自别于其他水波。

——钱锺书题《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我不拟阐述此文；我只是列出若干断片，自某种意义说去，它们是文的门。这些断片或多或少以截然的状态互相分离开来：我不想勾连、安排这些门；为了断然阻挠一切关联（一切评注的系统化），为了避免那展开的谈论，那渐次显露之主题的谈论，我给每个断片都标上题目，且使其依字母顺序排列——这自然既是一种次序，又是一种无序，一种撤空了意义的次序，零度的次序。

——罗兰·巴特《文门》（《S/Z》第 59 页译注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本书参考的钱锺书著述计有

《管锥编》(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谈艺录》(上、下卷),北京:三联书店,2001。

《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

《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

《写在人生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

《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

《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

《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人·兽·鬼》,北京:三联书店,2002。

《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2。

一、《人生边上的边上》收录作者自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之外的论文、随感、序跋、书评和译文等各类文字。书名由杨绛拟定。

二、本书在引用上述著述时均依凭此处标识之版本,只注明书(文)名及页码。

三、本书在引用《谈艺录》上下卷、《管锥编》第1—4册时不再注明卷数、册数。《管锥编》第5册为原书增订部分,引用时标有“增订”字样。

四、钱锺书著述原文所附外文根据需要有所取舍,不另注,敬请参阅原文。

面对互文性本身

序言

用

“互文性”理论诠释钱锺书的文学研究，首先得绕出一个“怪圈”。我的意思是说，尽管钱锺书极为关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常以互文阐释的方式研究文学，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此“互文性”混同于彼“互文性”，即西方文论所说的“互文性”。这里的吊诡意味在于，倘若没有解构批评“互文性”理论的启示，我们也许难以充分认识钱锺书从互文关系上研究文学的价值所在；可是在认真梳理了钱锺书互文研究的方法和特点之后，我们又发现他的研究思路和阐释策略，其实不同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

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不仅揭示了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指涉关系，而且，在后现代解构批评的语境中，“互文性”理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文本的意义由于互文关系而形成了不确定性，其源于文本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它意味着“互文性”理论是以解构的思路来理解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所以在阐释互文关系的实践中，解构批评往往会放弃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和判

断，仅仅关注其间的差异，通过追溯文本指涉关系的踪迹去显示意义的“延异”和“播撒”。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互文性”理论是批评解构文本的一种策略。

然而，钱锺书的文学互文性研究却没有这种解构主义的预设。钱锺书仅在文本意义的生成要受制于互文关系这一点上与解构思想相通，他曾引罗兰·巴特的话说，“法国新文评派宗师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著‘本文’；所谓‘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①正是这种认识让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中尤为关注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所造成的意义衍生，使他的文学批评打破了仅从作者一文本一世界的线性关系上阐释意义的成规。但是，对“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理解、对意义阐释的认识，以及在阐释策略的把握上，钱锺书的见解与作法却和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大相径庭。也就是说，钱锺书并不像解构批评那样，把互文关系造成的意义衍生视为一个没完没了的“延异”过程。相反，他倒是认为，文学研究可以在梳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指涉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互文关系形成的语境或脉络，去把握文本意义衍生的内在走

^①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0页。可以说明钱锺书对互文关系的理解具有解构意味的根据是，他不是从渊源关系而是在意义衍生的关系上来理解文本相互指涉这种现象的。据此，我们也可以对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出解释，那就是钱锺书为什么会和罗兰·巴特一样，为说明文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一个有限、封闭的空间之中，也把“文本”比喻为“洋葱”：“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谓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见《谈艺录》第611页）。罗兰·巴特在《风格与意象》里说，与其说文本是有核的杏子，倒不如把它比作“洋葱头”，“这是一种多层（或等级、系统）构造，它的体内没有中心，没有果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简化的原则。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欣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向。这说明，钱锺书认为研究互文关系能够让批评获得对文本意义更丰富同时也是更透彻的理解。

手边有个现成的例子，刚好可以拿来说明钱锺书互文研究的这种本土特色：

在书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文里，钱锺书对具有互文批评特点的集注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他在互文研究上的一些与西方文论不同的重要见解。比如，在说到集注如何引用前人的各种见解来诠释文本时，钱锺书借用韩愈的话说，注释者的取舍要尽可能地避免“贪多务得”和“挂一念万漏”两种倾向：“贪多的流弊是不能‘应无尽无’”，“挂漏的结果是不能‘应有尽有’”，并明确指出，“应无尽无也许还算容易，而应有尽有这件事实在不好办。”^①提出这两条说明，钱锺书认为文学研究对互文关系的把握要有一个限度或准则。虽然从理论上讲，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可能无穷无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必须一路穷追下去，更不是说他因此就有了可以任意解释互文关系的权力。而限制批评不能把互文关系无限推衍下去的那个“度”之所在，在钱锺书看来，就是集注的互文阐释是否能帮助我们“窥古人文心所在”，或者说，互文关系的追溯应以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为条件。

通过辨析韩愈的诗句“剖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的互文关系，钱锺书对上述观点作了更深入的阐释。他指出，前人注释此句，认为与佛教文本有关，《集释》的作者更引《大智度论》中的文字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但是钱锺书却认为，这种以词句

^① 钱锺书《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见《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8—339页。以下引文，未加注者均出于此文。

的类同来确认文本指涉关系的做法未免牵强。且不说“韩愈反佛教出了名，免不得就有和尚做翻案文章，说辟佛的韩愈也参禅信佛，也少不了有笺注家在他的诗里找出暗用释典的词句来”，这就很可能会误导批评对互文关系的确认。而批评此刻更应该注意的是，“刺血为墨，剥肤为纸”是六朝以来文人常用的话语，也是人们以身体比喻“文房四宝”很容易产生的联想，所以，“尽管不读佛经，一个人也会知道这个流行的佛教成语”，“尽管不受到印度的外来影响，一个人也会有那种想象。”这些很可能发生的事实也会让批评从释典中追寻互文关系的努力，成为一厢情愿或自作多情。

于是钱锺书以“了解之同情”的心理阐释，给我们梳理了另一条可以对“剖肝”做出更合理解释的互文线索。他说，“在这两句诗里，韩愈并非引用释典，而是极力避免释典”，“但是，除了皮肤，身体里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纸张呢？从纸张想到‘褚叶’，从‘褚叶’联想到中国古医书里所谓‘肝叶’——《黄帝难经》的第四十一难不是说么：‘肝独有二叶——应木叶也’？就此拼凑出那个很费解、极不浑成、毫无现实感的句子‘剖肝以为纸’来了！”引出这个解释的互文关系是靠“剖肝”之说的奇奥和韩愈反佛教的史实建立起来的，这说明，钱锺书追溯文本指涉关系的依据来自主文本及其生产的语境，而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互文阐释的原因，是因为它更透彻地解释了文本。由此可见，互文关系的梳理和把握，在钱锺书看来应是阐释文本意义的一种方式。

其实，钱锺书自己在这篇书评的最后已经把这个意思说透了，不过他用的是一种比喻性的、颇有风趣的说法：

“……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

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评点家、评论家、考订家。他们给你许多帮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烦。他们本来各归各的个体活动，现在聚集在一起，貌合神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如果集释也像解构批评那样，只管追溯文本指涉呈现的意义流变却不管各种见解是否有助于对文本的理解，甚至放弃对文本意义的把握，那就像“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去主持他们的会议”。

对互文性研究的这种定位，显然是西方互文性理论所没有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亚东认为钱锺书的互文性研究与西方互文性理论其实是一种对话关系。这个认识不仅让我们注意到了钱锺书互文性研究的本土特色和原创意义，而且在我看来，它也是亚东学风的体现，甚至对如何研究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

从思路上讲，讨论钱锺书文学研究的互文性特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拿西方的互文性理论去诠释钱锺书的互文性研究；二是从材料出发，通过材料的梳理总结钱锺书互文性研究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对亚东来说，前者面对的是现成的互文性理论，研究的程序是拿钱锺书的材料去印证他人的观点，这么做显然要容易一些，但难免会削足适履；而后者则是面对互文性本身，它要求研究者从原始材料中发掘观点、梳理思路，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更何况要研究的是钱锺书这样一位学富五车、思路活跃、每每以他的旁征博引让我们目不暇接的大家！我最初是希望亚东以第一种方式来撰写他的论文，但是几经调整之后，亚东却选择了第二种方式。读完他的论文定稿之

后，我庆幸他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更为他能在学风浮泛的今天依然坚守认真做学问的传统而高兴。

从如何研究的角度讲，“面对互文性本身”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接受西方种种新学并将其用于批评实践时，是否可以把它视角、方法、思路和它的结论区别开来。比如从视角和思路上讲，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让我们对一种虽然普遍存在却被我们熟视无睹的文学现象有了新的认识，互文关系的发现改变了解释创作和读解文本的传统思路。但是，认同互文现象并不等于我们必须把解构批评读解互文关系的那套理论全盘接受下来。用现象学的话语说，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和思路为我们构建了一种“互文性现象”，而解构批评由此断言文本没有自身的意义，则是它对“互文性现象”的一种解释。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能否把二者区别开来，或许就是“创造”和“复制”的分界线。

亚东的博士论文是一个极好的开端，我希望他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出色的成绩。

孙文宪

2007年3月于武汉

目 录

序 言 面对互文性本身 孙文宪 / 1

引 言 从钱锺书的旁征博引说起 / 1

第一章 互文性理论的中西对话 / 9

第一节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 10

一 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 / 10

二 结构主义路径 / 14

三 解构主义路径 / 16

第二节 互文性理论的多重意蕴 / 20

一 互文性理论的基本观点 / 20

二 互文性理论的建构维度 / 23

三 互文性理论的批评意义 / 28

第三节 中国本土的互文性资源 / 31

一 传统文论中的互文性思想 / 31

二 类书的互文性空间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 34

三 钱锺书对互文性问题的关注 / 40

第四节 钱锺书文学批评互文性特征之建构 / 42

- 一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言维度 / 42
- 二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历史维度 / 47
- 三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比较维度 / 50

第二章 互文关系的生成及显现 / 55

第一节 孳生 / 55

- 一 孳生现象的广泛存在 / 55
- 二 孳生现象的生成原因 / 59

第二节 暗合 / 67

- 一 暗合现象的广泛存在 / 67
- 二 暗合现象的生成原因 / 69

第三节 关系图式 / 77

- 一 寻找相似性 / 77
- 二 显性图式与隐性图式 / 79
- 三 描述与判断 / 83

第四节 网与链 / 89

- 一 文本的谱系 / 89
- 二 网与链的不同功能 / 92
- 三 网与链的内部结构 / 95

第三章 文中之文 / 99

第一节 异质之文的交织与共存 / 100

- 一 “互文是无名格式的总场” / 100
- 二 “物相杂故曰文” / 104

第二节 典故 / 109

- 一 基本态度 / 109
- 二 指涉与暗示 / 112

三 异质性的消除 / 114

四 典故的自注 / 117

第三节 词与句 / 119

一 语词 / 120

二 句法 / 126

第四节 命意与取象 / 131

一 命意 / 131

二 取象 / 136

第四章 转换与手法 / 141

第一节 模仿、改造与隐约的主体 / 142

一 模仿与改造 / 142

二 自我救赎 / 146

第二节 “吾犹昔人，非昔人也” / 150

一 传统与变革 / 150

二 差异性 / 153

三 “陌生化” / 156

第三节 手法技巧 / 158

一 对转换手法的关注 / 159

二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 161

三 其他转换手法 / 164

第四节 以反仿为例 / 169

一 反仿的多重含义 / 169

二 “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 / 172

三 “否定性互文构成原理” / 174

第五章 意义阐释 / 181

第一节 从阐释学出发 / 182

一	现代阐释学 / 182
二	“阐释之循环” / 184
三	“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 / 187
四	“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 / 190
第二节	现象·意义 / 193
一	“道理融贯迹象” / 194
二	“不耻支离事业” / 199
第三节	“连类举似”与“互映相发” / 203
一	自显自明 / 204
二	拈示意义 / 205
三	以诗解诗 / 206
四	互文归纳 / 209
五	修辞分析 / 213
第四节	记忆的力量 / 215
一	语境理论与互文阅读 / 215
二	没有边界的语境 / 217
三	“分享或遗忘” / 221
结语	特征及意义 / 227
一	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 / 227
二	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与西方文论的本土化 / 230
参考文献	/ 235
附录	/ 245
后记	/ 265

引言

从钱锺书的旁征博引说起

几乎所有的钱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旁征博引是钱锺书学术著作相当突出的特征。对钱著的阅读，常常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既兴奋又疲惫的状态——各式各样的文献引语，如碎片般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永远没有穷尽。

对于钱锺书著作的这种话语特征，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

一、认为其是钱锺书继承发扬“博采慎取”的传统治学精神的体现。作为对钱著旁征博引特征最通常的看法，持此观点者不仅对钱锺书的淹博学识、惊人记忆力以及锱铢累积的资料收集赞不绝口，而且认为在对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和发扬上，钱锺书堪为表率。有学者就指出：钱氏之学，可用博、大、精、深四字概括。一方面，钱锺书学养丰厚、涉猎广泛、广征博引，阅读钱著，“你会感到真正走进了一个美不胜收的、无

比丰富的学术宝库”；另一方面，钱氏治学又能做到“自有炉锤，善于熔冶，用宏取精”。论者因此说：“钱氏之学是博、大与精、深的完美结合，是真正地做到了博采而能会通，力索而能悟入”，“在百年的学术史上，偏于博大者有之，偏于精深者亦有之，博大而又精深如钱氏者，则罕见。”^① 这种对钱著旁征博引特征进行的分析，指出了钱锺书学术著作的外在话语特征和内在学术精神的关系，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二、认为其是钱锺书炫博矜学、热衷“掉书袋”的结果。在承认钱锺书淹博学识的同时，也有人把他的旁征博引看作是在有意卖弄学问，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有几则涉及钱锺书的评价就颇能说明问题。如1948年9月17日夏先生记：“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1953年9月8日又记：“阅钱锺书谈艺录，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② 应该说，夏先生这两段话臧否人物是非常持正的，不过“取证稠叠”、“积卡片”、“逞博”之类的说法，显然表明他并不完全认可钱锺书在学术研究中旁征博引的必要性。这种认识实际上也代表了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三、认为其是钱锺书在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上缺乏创建性的表现。把钱锺书的引经据典当作炫博矜学、“掉书袋”的看法，主要还是指出他在文献征引方面存在着“过量”的倾向，并未完全否认博览强记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与此不同，有一种观点则彻底颠覆了钱著旁征博引的意义。这种观点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大量征引文献资料，正表明钱锺书只有零碎的知识而缺乏个人的见解和完整的体系。如有人主张按照有无思想体系“可以把全世界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我们如果对钱锺书进行客观的定位，那么，就必须承认他只是一个第三个层次上的学者”，即“对某一具体学科有很深

①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锺书先生》，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第43—46页。作者还说：“一生阅读学术著作无数，其上焉者，使人惊服、赞佩的，自然颇不乏例，但如钱氏著作那样汪洋宏富，博大精深，涉猎领域那样广泛（历史的、哲学的、经学的、佛学的、人类文化学的、语言学的、校勘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和文学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驰骋和联类那样自如和自由，却极少见。”

②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三），见《夏承焘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页，第344页。